

# 启蒙的科学精神及其影响

## ——兼论理解启蒙的基本立场

黄学胜

(南昌大学 哲学系,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理解启蒙是推进或批判启蒙的基本前提。对启蒙的真切领会只有结合其科学精神,才能切中肯綮。自然科学对启蒙时代具有革命性意义;以自然取代上帝,以自然科学方法取代演绎方法以及以自然主义方式确证人道主义;建立在自然科学模式基础上,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旦将这种科学精神绝对化,变成唯科学主义,在逻辑上便通向各种现代性问题。对待启蒙的基本立场须超越要么否定要么肯定的怪圈,应在领会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看到其深刻影响,进而加以历史地反思。

**关键词:**启蒙;科学精神;自然科学;现代性;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基本立场

**中图分类号:**B504/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2-0030-08

启蒙对现代世界及其意识形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不管是韦伯、尼采、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的否定,还是哈贝马斯为促进现代性的生成而欲推进启蒙,其基本共识是:要理解现代社会的诞生与内在结构(包括思维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世界影响,势必要通过对启蒙的再度反思与批判来实现。如福柯所言:“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正试图回答两个世纪之前如此鲁莽地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sup>[1]422-423</sup>这种反思与批判,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启蒙?

这里的“启蒙”特指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本质说来,现代世界的成就及其各种问题正是这次启蒙运动的结果。时兴的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呈现出对启蒙的多元化理解,甚至陷入了相互批判的境遇中。本文以为,任何对这次启蒙运动的真正理解,都不能离开对其科学精神的真切领会,否则将难切中肯綮。对启蒙的科学精神的把握又应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肯定或否定的论断,应如奥斯本所说的“考虑到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程度,以及它对启蒙的重要影响”<sup>[2]82</sup>。此外,笔者以为,还应进一步考察基于推崇自然科学精神的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的诸多影响。唯此,才能有助于学界对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及其后果的领会和把握,也才能在推进启蒙或者反思与批判启蒙等问题上有所深入。

### 一、理解启蒙应关联其科学精神

我们知道,启蒙本身是复杂多元的,其内涵之复杂不仅体现于不同的启蒙人物及其思想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对立,还体现于甚至是同一个启蒙人物自身的观点的复杂多变;启蒙还波及广泛,不仅形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还盛行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如波

收稿日期:2015-06-07

作者简介:黄学胜,哲学博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南昌大学赣江青年学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对启蒙的批判及其意义研究”(14CZX006),项目负责人:黄学胜。

兰、瑞典、丹麦、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等，甚至远赴美国，形成了美国的启蒙运动。这就决定了对启蒙的理解一定会呈现出多元化乃至相互对立的样态。正因此，对启蒙的正确理解当然须要超越于细枝末节的把握路向，上升为一般化的总体概观，正如贝克尔说的“舆论的气候”<sup>[3]11</sup>以及卡西尔所言的“哲学精神的现象学”<sup>[4]2</sup>，就是要理解启蒙运动中起支配地位的基本精神。

现代主义者如哈贝马斯等人对启蒙的肯定多是以康德有关启蒙定义作为理解启蒙的典范。康德于1784年试图回答策尔纳无意间提出的“什么是启蒙？”问题时，提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sup>[5]23</sup>康德将启蒙的本质和核心定义为弘扬理性，意味着人依靠自己的理性走向成熟，构建起人与世界的新关联，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同时，康德将能够理性自主的人称为自由的人。理性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和自我决定。实现了启蒙的人就是理性自主和自由的人，从而康德将理性与自由等同起来以走出人类的“未成年状态”，最终实现启蒙。康德的确是把握了启蒙运动的核心要素即理性自由。但问题在于，在康德的视域中，理性自由更多是在德语境中得到理解的，这里的启蒙也是经康德强化了了的德国版的启蒙运动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启蒙运动自英国发轫经法国唯物主义的大力张扬再传到德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全基于康德的理解而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领会多少是片面的或成问题的。

正因此，福柯起而发难康德。他向康德的理解提出了三点疑问：(1)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是否具有思想史的合法性，因为他认为康德几乎是以完全消极的方式在给启蒙下定义，将其理解为出口或出路。(2)他批判康德在将启蒙到底是理解为一个历史事件还是理解为伦理意义上人类应当承担的义务或责任时，语焉不详。(3)他怀疑康德的启蒙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康德涉及的“人类”概念必然是指全体人类，这样的话，启蒙应视为一种历史性变化，而启蒙也根本无法使整个人类成熟起来。<sup>[6]</sup>由此，福柯提出应当从知识、权力和自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理解启蒙，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启蒙的观点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总体的精神气质或态度，而非特定的教条。”<sup>[2]2</sup>这实际上是从后现代的角度将启蒙等同于现代性问题，并将启蒙与其人文主义传统截然对立起来，将对理性的强调与自由的实现对立起来，从而反对将启蒙视为近代的历史事件，认为应视为涉及全人类的“一种态度的永恒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sup>[1]433-434</sup>。这种观点，正如格里芬、罗蒂、詹姆逊等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一样，显示了更多难能可贵的批判和反思启蒙的一面，对人们清醒地理解启蒙的现实后果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事实上又使得作为一种特定历史事件的近代启蒙的精神实质及其重要价值处于晦暗不明当中。所以，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解，应当跳出或者肯定、或者否定的怪圈。

康德有关理性自由以及福柯有关批判精神的规定，诚然都可以视为启蒙的基本精神，但这不能离开18世纪盛行的科学精神语境来看。应当说，科学精神是整个启蒙时代的基本精神，康德和福柯所说的对理性自由的理解及其批判精神，都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被后现代主义者所主题化的对现代成就及其问题的反思，也应当在科学精神盛行乃至是变异的情况下得到理解。当我们称“启蒙运动”是“用来描述18世纪的一场重大思想、文化运动的术语，这场运动的特征是深信人类知识能够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sup>[7]11</sup>时，这种对人类知识的深信不疑，假若离开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及其在方法论和知识论意义上的变革作用，将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启蒙运动的一个根本主题就是吸取由开普勒和伽利略开始，经笛卡尔和莱布尼茨深化，到牛顿得以完成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及其方法，并将其“扩展和完善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工程和社会工程”，借此，“启蒙运动被确立为一种时代原型，其中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明确特征”。<sup>[8]</sup>正是自然科学及其培植的科学精神的盛行，才使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因此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

式和存在方式,神学被自然科学取代,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向其他一切领域和学科的渗透成为智识世界的基本主题。

自然科学在18世纪俨然具有王者地位,以至于在卡西尔看来:“达朗贝尔称18世纪为哲学世纪,但是,18世纪还常常同样言之有理地、骄傲地自诩为自然科学的世纪。”<sup>[4]42</sup> 奥斯本也指出,启蒙运动时期是“以尊崇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为特征的时代,或者可以将之简化为一个名字——伊萨克·牛顿”<sup>[2]75</sup>。卡尔·贝克尔在《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中揭示了牛顿在18世纪受欢迎的程度:“一般人在18世纪中叶对牛顿哲学的熟悉,就正如我们今天对‘达尔文哲学’。”他还引述伏尔泰的解释说:“很少有人阅读牛顿,因为必须有学问才能理解他。可是人人却都在谈论他。”<sup>[3]62</sup> 汉金斯指出:“启蒙运动的科学就是‘牛顿的’,其哲学就是‘牛顿主义’的哲学。”<sup>[9]10</sup> 而蒲伯的诗:“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暗夜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变得光明”<sup>[4]41</sup>,则最强有力地表明启蒙运动对牛顿的推崇。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奥斯本所言,任何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就“既不寻求为任何特定的自然科学进行合法化,也不以反科学偏见的名义进行科学批判。实际上,启蒙批判应该考察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程度,以及这种伦理特征在更普遍意义上对启蒙具有的重要程度”<sup>[2]82</sup>。

## 二、自然科学对启蒙时代的革命性意义

我们知道,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美洲新大陆的开辟以来,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和解放问题提上了时代日程。这通过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进一步在哲学基础上确立了人相对于上帝的优先性,自然科学则从经验领域实现了对物理世界的解蔽,这在另一种意义上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从16世纪中叶开始起步,经过哥白尼和开普勒,到伽利略对科学实验方法的重视和笛卡尔借助动力学的研究而提出了能量守恒假说,再到牛顿那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牛顿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集大成者,进一步完成了由伽利略提出的用一种统一性的原则来把握整个宇宙的问题。他提出三条动力学的基本规律以及万有引力定律,证明了包括地球和天体在内的整个宇宙都服从于普遍一致的运动规律。牛顿自然科学的成就证明了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力量能够理解和把握整个世界,从而使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昏暗和神秘状态的宇宙世界沐浴在阳光之下。

自然科学的成就对人的思想解放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方面是解放了人的思想,使人从宗教世界观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还确证了人的知识力量,为人们在世俗的人间重建“天国”提供了工具和视野。正如卡西尔所言,牛顿的自然科学证明了人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够把握宇宙内在的基本秩序或规律,证明了“知识的力量”和自然力一样,“也是一种同样基本的力量”,从而“宣告了人类知识的胜利”。而“整个18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和评价牛顿的成就的。它赞誉牛顿为伟大的经验科学家;它还进而强调指出,牛顿不仅为自然,还为哲学建立了坚实的准则。”<sup>[4]40</sup> 18世纪是“科学的世纪”,就是理性和光明的世纪。自然科学在启蒙时代的革命性意义具体体现在:

### (一)以“自然”取代了“上帝”

启蒙之前起支配地位的是宗教世界观,“上帝”、罪恶、神恩、得救、天国等是其关键性词汇。真理的保证来自于《圣经》和上帝的恩典。在那里,“对自然[人性]的理想形象——我们可以这么说——都有太多的神怪气,而不致被人误认作就是自然界本身。”“自然界本身从常识看来似乎一直是难以对付的,甚至于是神秘的和危险的,最好也是与人不相和谐的。”<sup>[3]57</sup> 面对神秘的自然,人们只能求助于来自哲学家和神学家们的保证。人与自然是上帝的造物,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知识领域的思维工具是演绎逻辑。“神学述说和阐释了世界历史。哲学乃是对自然界和历史进行合理化并加以调解的学问。逻辑学则对神学和哲学双方都提供了一种合适的方法论。”<sup>[3]19</sup> 其结果就是大自然被认为是“只不过是存在于上帝的心灵之中并微弱地反映在哲学家们的心灵之中的一种逻辑结构而已”<sup>[3]58</sup>。

18世纪的情形是,自然的观念取代了上帝的观念,时代的关键词汇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

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sup>[3]51</sup>等。伏尔泰就将自然界与宗教的关系颠倒过来,提出“自然界所教导于一切人的自然律”是“一切宗教都奠基于其上的”东西。霍尔巴赫也摒弃了一切宗教,提出“适用于人类的道德应该是奠定在人性的基础之上的”。甚至是基督徒,也都“承认自然界这部大书的权威”<sup>[3]55</sup>,意见的分歧限于“自然”这种权威所涉及的范围。用贝克尔的话说:“在 18 世纪舆论的气候之下,不管你是寻求对什么问题的答案,自然界总是验证和标准;人们的思想、习俗和制度加入要想达到完美之境,就显示必须与‘自然界在一切时间里、向一切人所显示’的那些规律相一致。”<sup>[3]55</sup>

在这里,所谓的自然界不再是一个逻辑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自然律也不是一种逻辑演绎的结构,而是“被人观察得到的各种物质对象的和谐的行为”。<sup>[3]59</sup>自然律就是事物自身的内在秩序和规律。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正是受惠于 17 世纪的自然科学。一方面自然科学自身取得了足以令人信服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成就显示了一条通向知识的新途径的可能性,即“去钻研事物的本身”,然后总结出“事物本身所由以形成的那些普遍的自然规律”<sup>[3]59-60</sup>。这实际上是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式来取代演绎推理,从而扩充了人们的知识领域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思考,潜在地确证了“人”相对于“上帝”的主体性地位,将人们对上帝(或《圣经》)的关注转向了对自然、自然律或自然秩序的关注。与中世纪强调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相比,此时,思想界强调的是历史学、科学和计量的技术。启蒙哲人认为只有将自然的事物理解为“一桩正在行进之中的事业”,“才能理解它”。<sup>[3]26</sup>于是作为研究人类活动的经验领域的历史学方式得以确立。科学研究物理世界,计量的技术则是人类获得新知识的有效工具和方法。

总体上看,正如黑格尔评述法国哲学所说的,启蒙时代的总的思想路向“是向唯物论或自然主义迈进的”,就是把“感觉和物质看成唯一真实的东西,把一切思维、一切道德方面的东西全都归结为感觉和物质,认为只是感觉的变相”<sup>[10]230</sup>。在这种思想倾向主导下,机械哲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三股思潮奠定了启蒙思想结构的基础。<sup>①</sup>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说,启蒙运动之所以推崇牛顿,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有了牛顿”,启蒙思想“才最终站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自然科学的任何未来的革命,都绝不可能再次动摇这个基础。自然和人类知识之间的联系已一劳永逸地确立下来,从此再不可能被割断了”<sup>[4]41</sup>。

## (二)自然科学方法的示范效应

牛顿自然科学所以能够起到上述效果,居功至伟的是其所使用的自然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被运用于探索物理世界,并且取得了巨大成效。这样就给 18 世纪提供了一种区别于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的准则”:后者力图构造哲学“体系”,前者则明确反对这种“体系癖”,而力图“扩展真理和哲学的范围,使它们更灵活、更具体、更有生命力”<sup>[4]5</sup>。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启示下,启蒙哲人们相信人类理智的进步能够实现这一目的。“18 世纪没有跟着以往哲学学说中的那种思维方式亦步亦趋;相反,它按照当时自然科学的榜样和模式树立了自己的理想。”<sup>[4]5</sup>

牛顿自然科学方法区别于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方法。后者是从原理、一般概念和公理出发,借助于抽象推理,再获得关于特殊、关于“事实”的知识;前者则相反,从“经验材料”出发,并且研究“经验材料”,以图“得出一些原理”<sup>[4]5</sup>,即找出“物质世界的普遍秩序和规律”,然后“用数学方法”,“按照数和量度”<sup>[4]6</sup>构建和排列研究对象,最后揭示蕴含在经验世界中的普遍性原理和规律。这确立了分析和综合的实验主义方法的重要地位,以至于“整个 18 世纪思想就是以这种新的方法论纲领

<sup>①</sup> 《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作者指出,正是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为启蒙运动的诞生营造了基本的思想环境。它使自然秩序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机械哲学是从物质和运动的角度解释一切自然现象,还用数学语言来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理性主义则赋予人类理性以极大的力量,但理性的运作必须依据几何学所证明的逻辑演绎的法则。经验主义则要求从经验和实验中观察客观事物,认为这种方法能够秉承理性来推行秩序,并最终揭示出事物的基本结构。而正是这三股思潮奠定了启蒙运动思想结构的基础。来自这三股思潮的结论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张力就决定了启蒙运动的话语。参见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刘北成、王皖强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2 页。

为特征的”<sup>[4]6</sup>。对18世纪而言,这种经验主义方法的意义在于:首先,自然科学证明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能够和谐统一起来,前提是人们不是去先验地把握和表述秩序和规律,而是从现象本身以及现象的内在联系中去发现这种规律性。这就否定了神学演绎推理的垄断性地位,促进了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极大发展。其次,实现了对自然的数学化阐释,确立了数学思维和数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就使得“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本身成为——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数学的集”<sup>[11]27</sup>。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量化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这在往后推进了机械性的、还原论的和齐一化的思维方式的流行,也即是说效仿自然科学的模式就是用一种普遍主义的逻辑来综合杂多,以揭示其中的普遍规律,然后用数学化的方式表述出来。在这种思路主导下,整个宇宙被视为一架巨大的机器,受着机械运动规律的支配,由此近代科学以探寻宇宙的“动力因”取代了古代科学对宇宙的“目的因”思考。推而广之,人和社会也都被视为一架机器,受着机械规律的支配。其典型体现就是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人们的理性观。“理性”在17世纪是“‘永恒真理’的王国,是人和神的头脑里共有的那些真理的王国。因此,我们通过理性所认识的,就是我们在‘上帝’身上直接看到的东西。理性的每一个活动,都使我们确信我们参与了神的本质,并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心智世界、通往超感觉的绝对世界的大门”。在18世纪,“理性”则在一种朴素的意义上被理解,它“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不是一种遗产,而是“一种后天获得物”,它不是一座精神宝库,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在这里,“理性”被“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具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分解之后就开始重建。理性不能在这一堆支离破碎的废墟前停步;它不得不从中建立起一座新的大厦,一个真正的整体。”<sup>[4]11</sup>实际上,“理性”就是一种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18世纪作为“理性的世纪”也主要是在这层理性的内涵上来理解的。它把理性树立为最高的权威,实际上是把科学理性树立为最高的权威。一切都必须经受住这种理性的检验。反观之,康德说的理性自由也主要不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规定,而恰恰是一种具有分析和重建功能意义的知性能力。借助这种能力,人确认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重新规定了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关系,还给人们以无限的信心,认为在理性基础上的人类知识领域的扩展,一定会带来道德进步和人的最终幸福。由此,启蒙时代弥漫着浓烈的理性主义、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精神。

### (三)以自然主义来确证人道主义

在牛顿自然科学成就及其方法的鼓舞和激励下,启蒙运动试图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实现对人道主义的肯定。如果说“自然”或“自然秩序”取代“上帝”成了思想界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示范了研究“自然”的可能性及其效力,那么所有上述转变都引向关注人本身,以实现对人及其生活的人道主义肯定。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生活等等是启蒙哲人所有努力的旨归。按照邓晓芒先生的说法:“正是对人类普遍本质的这种人道主义意识,才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实质。”<sup>[12]</sup>为此,启蒙哲人也采取了自然科学的普遍模式。他们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本性(即理性)出发激烈批判了宗教,另一方面还力图构建一个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人间“天国”(即理性国家)。

对宗教的批判,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是两种主要方式。牛顿、洛克、曼德维尔、孟德斯鸠等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普遍采取自然主义的方式来调和宗教信仰与人的理性,力图既维持宗教信仰,又确证人的理性的主体性地位。为此自然神论者普遍采取了一种“钟表匠”的比喻,认为世界如同一座钟表,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上帝创造了它之后就退隐幕后,不再干涉,人借助自己的理性能力揭示的自然世界之和谐或规律恰好证明了神圣而仁慈的造物主的存在。这种高明的宗教批判表面上确立了宗教的理性基础,实际上却将上帝推翻在地,凸显了人及其主体地位。无神论是宗教批判的极端

形式,以霍尔巴赫、拉美特利等人代表,彻底化了牛顿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倾向,并将其推及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在他们看来,“一切自然过程,包括通常所说的‘精神’过程,事物的整个物理的和道德的秩序,都可以还原为物质和运动,都能用这两个概念完满地加以解释。”他们相信:“只要理智敢于踩在自然的地面上,勇于面对自然,自然之谜就会烟消云散。”<sup>[4]61</sup>在这里,理性被明确抬高到王者的地位,上帝和宗教都被视为骗子和人类道德的敌人,人被视为一架受着机械规律支配的极其精妙的机器,精神和观念都是由感官的刺激引起的。

应当强调,启蒙时代的宗教批判并非完全否定信仰,只是希望将人的信仰建立在理性自主的基础之上,以摆脱蒙昧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其目的从本质上来看,正如贝克尔所言,是建立一种新的人道宗教:“(1)人并不是天生来就腐化了的;(2)人生的目的就是生命本身,是在大地上的美好生活而不是死后的赐福生活;(3)人惟有受到理性和经验的光明所引导,才能够完善大地上的美好生活;(4)大地上美好生活的首要条件就是从愚昧和迷信的枷锁之下解放人们的心灵,从既定的社会权威的专横压迫之下,解放他们的人身。”<sup>[3]98</sup>

将人从宗教世界观解放出来后,启蒙哲学便将视野转向了现实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批判,力图建构一个符合人之自然本性的全面健康发展的社会制度。这其实还是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在展开政治设计,于是,“自然法”、“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说”成了基本出发点。尽管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政治哲学家们在具体观点上多有差异,但他们都普遍提出了“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说,即从自然法或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出发,力图通过社会契约论的形式构建理性王国,以实现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人的尊严、幸福、人道生活等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基本观念。这其实就是一种用自然主义的方式实现对人道主义的肯定。其往后的影响,于理论而言,在启蒙时代的康德“人类的永久和平”状态,黑格尔“伦理的总体性”的普鲁士国家以及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是有回响的。卡尔·洛维特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加以展开的。于现实的后果而言,法国大革命就是其最直接的后果。

总而言之,上述诸方面显示了自然科学在启蒙时代的地位及其革命性意义,它改变了:(1)人们的关注对象:从宗教到自然;(2)人们的研究方法:从演绎推理到分析综合;(3)提出了人的解放问题:从天国到人间。相应地,它也形成和确立了当代人一系列的基本价值观和思维倾向: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理性与信仰等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数学化的普遍主义的思维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参量如人权、理性自主、科学、民主、人的幸福、民族国家、进步主义等,而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启蒙的科学精神中产生出来或找到其存在的根据。现代世界正是自然科学所推动和塑造的世界。如果把启蒙理解为历史事件,而不是抽象地加以考察,不是把它理解为一种世界观或普世哲学的话,那么上述结论就是最基本的。

### 三、18 世纪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的影响

深受牛顿自然科学的影响并且将自然科学模式推向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的 18 世纪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反思启蒙首先应肯定的基本方面。

首先,正如上文所说,启蒙运动促进了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按照米兰·扎菲洛夫斯基的理解,现代西方世界的基本价值观,诸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包容、人权、尊严、康乐和幸福、人道生活、公民自由、科学的理性主义、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与乐观主义、经济繁荣、自由市场、世俗主义、多元主义与多样性、个人主义、普遍主义、人道主义等,特别是其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和理性等价值观,“都基本上可以将启蒙运动的理想和遗产作为他们的基础和起源”<sup>[13]1</sup>。如果说,启蒙运动并不是这些价值观唯一的来源的话,那它也强化和进一步塑造了这些价值观。关键在于,它通过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模式给予这些价值观以思想根据和理论支撑,同时还为实现这些价值观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指导。没有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没有启蒙对科学的强调和推崇,这些价值观就还是隐含在各种资源当中,难以产生巨

大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在启蒙的科学精神主导下,这些基本价值观才成为现代世界的基本主题。

其次,整个社会制度和结构的改变。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都是践行上述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实践,这体现为政治领域的变革:从封建等级制度到现代民族国家,后者正是在自然科学模式主导下展开的政治设计或规划的实际成果,目的是保障人的自然权利,建立符合人之本性健康全面发展的理性王国。尽管这一王国后来破产了,被证明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但其初衷和目的是明确体现在法国 1789 年公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在社会领域的变革则通过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运用特别是工商业中的运用得到了体现。科技发明,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完成,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巨大改变,带来了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整个现代社会进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时代。对于自然科学及其成就对社会的巨大变革,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肯定:“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sup>[14]88</sup>他批判当时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忽视,高度肯定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sup>[14]89</sup>马克思还将人类解放的期望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sup>[14]90</sup>这无疑显示了启蒙的科学精神对整个时代产生的深刻影响。

再次,在对自然科学的推崇和信任的前提下,在思想领域树立了“科学”的权威,推动了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现代人开始把科学看得比神学和哲学都更加重要,“19 世纪以前,科学家还不是一种职业。进入 19 世纪,越来越多的科学团体出现,各国政府开始重视大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功能,各种专业学术期刊随之诞生。科学研究成了社会分工中十分重要的部类,科学已经彻底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历程。在 19 世纪,职业化、专业化、经验化的科学主义已经盛行。”<sup>[15]</sup>这当然要归功于自然科学将人们的注意力由上帝向自然的转变。由此开始,科学的领域才在宇宙世界中大道起来,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农学、生命科学、化学、信息科学等现代学科建立起来,学科体系越来越丰富和细化,自然科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和细致。这同时也带来了现代世界的各项科技革命,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正是因为科学世界观被普遍接受和科学方法的日益权威,使得自然科学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也成为一种时髦。”<sup>[15]</sup>这首先体现在马克思所面对的三大思想传统中。马克思称之为“启蒙国民经济学”的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从“自然秩序”概念出发,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而要求构建一种符合人之本性的社会制度,最终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当成一种理想的和永恒的社会制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法国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在坚守理性概念的基础上,试图克服启蒙之后的不人道现象,而构建一个真正实现了永恒的正义、理性和绝对真理的王国,这其实还是力图将自然科学的模式引向社会历史。对社会历史的关注,后来在孔德那里建立了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体系,从而将对社会的研究也引到了科学的大道上。在哲学领域,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依然还是借助“自然的力量论证了人类历史的合理性,并将‘人类历史的整体’造化般地看成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sup>[16]</sup>。黑格尔则进一步将康德突显的历史逻辑加以强化,使之进一步发展和完成为绝对精神运动和发展的历史哲学。同时黑格尔哲学也将实现了从异化到自身复归的科学称为精神科学。现代西方哲学当中,不管是分析哲学、科学哲学还是现象学、解释学等等,也都力图将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或者将哲学变成科学。马克思也深受科学影响,力图将历史哲学变成历史科学,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sup>[17]66</sup>。历史科学强调“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将自然和历史统一起来进行科学的阐释,这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的权威。后来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经济决定论的阐释,实际上一方面是受到了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马克思本人表现出了对科学的极大推崇所致。上述所有这些都表明自然科学对现代各个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使得科学观念的深入人心,最终带来了科学一元论的价值观的形成。

最后,带来了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化。在上述各种影响之下,世界历史进程以及人们的历史观念也在发生改变。在历史进程方面,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由封建主义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以

其现代国家制度、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基于维护和保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的普世价值向世界各地扩张,带来了全球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用服务于增值目标的资本原则以及作为其意识形态支撑的现代理性形而上学,再加上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巨大改变。在现代世界,科学技术也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运行。其所带来的世界影响,用《共产党宣言》当中的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17]275-277</sup>,总之,它使得“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读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sup>[17]275</sup>在历史观念方面,历史被明确为人的而非神的历史。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产物。“历史”自启蒙时代的由理性昌盛或衰败的历史经德国古典哲学的绝对精神的逻辑展开和最终实现了“伦理的总体性”的历史,到马克思那里,变成了人借助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并且通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最终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有这些观念的变化背后都深受自然科学观念的极大影响,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人类解放理想,可以说正是近代自然科学模式向历史领域推进和深化的产物。

总而言之,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塑造都不能离开其对科学精神的极大推崇,在现代世界各种观念、制度设计和学科设计方面都隐含着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及其模式。因此,如果说要正确理解启蒙的内涵及其实质,从而评估启蒙对现代世界的巨大影响,反思其带来的各种问题,不可不关联到其科学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想见,一旦将这种科学精神绝对化,变成唯科学主义,那么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生态破坏、人的异化、自由王国的破除、技术的统治等各种现代性问题的滋生。当然,各种现代性问题的产生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启蒙,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进程,各种社会和历史因素也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也是我们对待启蒙应秉持的基本立场:万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可一概肯定,应该在领会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看到其深刻影响,进而加以历史地反思。

#### 参考文献:

- [1] 王晖,陈燕谷,主编. 文化与公共性[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2] 奥斯本. 启蒙面面观[M]. 郑丹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3] 贝克尔. 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M]. 何兆武,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4] 卡西尔. 启蒙哲学[M]. 顾伟铭,等,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 [5]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6] 张政文. 康德与福柯:启蒙与现代性之争[J]. 哲学动态,2005(12):8-12.
- [7] 赖尔,威尔逊. 启蒙运动百科全书[Z]. 刘北成,王皖强,编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8] 郝苑,孟建伟. 科学与启蒙精神[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6):55-62.
- [9] 汉金斯. 科学与启蒙运动[M]. 任定成,张爱珍,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10]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1] 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 张庆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12] 邓晓芒. 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J]. 史学月刊,2007(9):10-15.
- [13] MILAN Zafirovski. The enlightenment and its effects on modern society[M]. Springer New York Dordrecht Heidelberg London, 2011.
- [1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5] 沈湘平. 马克思视野中的“科学”——兼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的本质区别[J]. 天津社会科学,2010(6):21-28,34.
- [16] 邹诗鹏. 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与转化[J]. 哲学研究,2008(6):3-9,127.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刘荣军

网 址: <http://xbj.swu.edu.cn>